

# 减税降费应提升为制度性红利

本报特约评论员

## 一种说法

### 欺凌者是否就读专门学校应有程序正义

史洪举

4月17日,湖北省教育厅联合省内8部门发文,要求“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明确提出,对“屡教不改、多次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必要时转入专门学校就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称,转入专门学校目前实行“三同意原则”,即本人、学校及家长均同意,以保障未成年入权益。因此,目前国内各地“专门学校”普遍存在生源不足状况,大量需要特别看护的未成年人,没有得到应有的专门教育。

根据湖北省的意见,所谓“专门学校”,即指曾经的“工读学校”,在满足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对在校学生实施重点看护。一般来说,专门学校的管理更为严格,甚至实行一对一看护,有“惩戒”未成年施暴者的意味。因此,是否要求施暴者进入专门学校,应设置科学公正的程序,尽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权益,而非拘泥于“三同意原则”。

近年来,校园暴力、校园欺凌事件时有发生,且很多事件情节极其恶劣,令人发指。但普通学校却无法对学生行使相应的干预、矫正、惩戒等权力。而且,多数中小学在校生未满16周岁,甚至未满14周岁,即便其非常顽皮难以管教,甚至对他人施暴造成严重后果,也无法对其施加治安管理处罚,追究刑事制裁。即当前缺乏有效的教育管理手段让犯错学生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意义和对他人权利的尊重。

就读专门学校则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施暴者进入专门学校,既可以避免其在普通学校继续无法无天、欺凌他人,又可以避免被普通学校“抛弃”后流落社会,走上邪路,还可以施加更严格的教育乃至惩戒措施以矫正其不良行为,挽救迷失的灵魂。2016年11月1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也指出,对屡教不改、多次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应登记在案并将其表现记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必要时转入专门学校就读。

但目前的“三同意原则”却成了阻碍施暴者就读专门学校的主要障碍。由于一些人对专门学校及工读学校还存在误解,认为工读学校的名声不好。加之这些学校管理较为严格,甚至有可能“采取适当的矫治措施予以教育惩戒”。一些父母很可能基于娇惯溺爱子女角度出发,拒绝将施暴者转入专门学校,施暴者本人可能更不乐意。这样一来,专门学校自然会形同虚设,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应当说,“三同意原则”旨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属于程序正义。但遗憾的是,该原则唯独没有考虑受害人意见,这样的程序正义其实欠缺科学性和合理性,不是真正的程序正义。要知道,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基本上均是未成年人,这些人的身心创伤更应该得到及时抚慰,其合法权益更不能被漠视。本身施暴者有错在先,要是不再回避矛盾,以保护权益为名不敢触动施暴者利益,受害人将更加感受不到公平正义和制度温暖。譬如,施暴者如果继续与受害人同处一个学校,很可能还会发生暴力或欺凌事件,让受害人雪上加霜。

因此,是否让施暴者就读专门学校,应摒弃“三同意原则”,注重参考受害人意见。或者说,可从更为超脱的第三方立场出发,不被受害人或施暴者“意见”羁绊。如要求心理专家及教育专家对施暴者的心理和人格作出全面评估鉴定,并在此基础上举行包括未成年入保护机构、公益组织、受害人、施暴者共同参与的听证。以更加科学、合理、妥善地对待施暴者,让应该接受专门教育者接受适当教育,成长为健全的社会个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一季度已出台降费2000亿元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减税举措。这些措施全部到位后,加上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今年前4个月翘尾减收,预计全年将再减轻各类市场主体税负3800多亿元。

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提振国家竞争力,在新经济周期领跑全球市场的应有之义。减税降费是送给企业的礼包和福利,在增强企业获得感的同时,也应当蝶变为制度性红利。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减税降费,但效率和力度莫若中国。以美国政府为例,特朗普遭内政挫折,宏大的减税计划至今尚未着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也未能启动。而中国在2014年和2015年两年,减税降费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均超过1000亿元;2016年通过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元,并且所有行业实现税负只减不增。不过,由于税制设计不合理,尤其各类行政性收费项目过多过滥,加之地方执行力不够,数千亿的减税降费撒到整个市场,市场主体并未有太强的获得感。

所以,减税降费仍然是中国的施政重点,也是政策性“进行时”,应当伴随供给侧改革的全过程。李克强总理说得对:“政府

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而且是和新市场、新技术紧密对接的实体经济。多种所有制下的市场主体要相互渗透和充分竞争,新业态下的共享经济新模式也要互联互通。减税降费福利鼓励的上述市场主体,而非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楼市和空手套白狼的投机者。

过紧日子,让企业轻装上阵,人民才能过好日子”。从各级权力部门降低、取消名目繁多的行政性收费和基金,到普通民众社保费的降低,都在形成集体、有意识的亲商环境。同时,中国社会也在进行优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改革,促使权力主导的税费合一制向法治规范和契合市场规则的公平税负方向转变。

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减税降费,最大亮点在于推进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从7月1日起,将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17%、11%和6%三档,取消13%这一档税率,将农产品、天然气等增值税税率从13%降至11%。同时,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购入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避免因进项抵扣减少而增加税负。减法加法同时

做,使包括粮食、林木、水产、鲜奶等农产品,自来水、暖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以及农药、农机等项目所涉市场主体,都能有实实在在的减负获得感。给予市场主体的减税优惠,既可以传导至市场终端的公众,也可体现政策面对涉农企业的一贯关怀。多向实体经济、小微涉农以及和民生密切相关紧密的市场倾斜,折射政策面精准切实体的苦心。

宏观经济不能靠虚拟经济的虚假繁荣去支撑,也不能依赖垄断产业和极少数巨无霸市场主体。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础是实体经济,而且是和新市场、新技术紧密对接的实体经济。多种所有制下的市场主体要相互渗透和充分竞争,新业态下的共享经济新模式也要互联互通——既要成为传统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又要变成“两创”的产业孵化器。减税降费福利鼓励的上述市场主体,而非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楼市和空手套白狼的投机者。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成绩单不错,经济增长速度为6.9%,这其中就有减税降费成果。让实体经济更强大,除了给楼市降去虚火,给资本市场戴上监管“笼头”,更重要的是让实体经济沉下心来做实体,让各路资本放下心来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就此而言,楼市调控也好,减税降费也罢,还是处于政策性施惠——“授之以鱼”的初级福利阶段。长期而言,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形成符合法治规范和市场诉求的制度性,才是“授之以渔”的市场红利。

减税降费应当提升为制度性红利,供给侧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 非常视点 人工智能的偏见能消除吗?

张田勘

当人们在为人工智能进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欢呼,并以为人工智能可能让人类进入新的文明时代而充满无限美妙的憧憬之时,一种新忧虑产生了:人工智能也会像人类一样产生种种偏见和歧视,而且,这种偏见和歧视与生俱来,是人类教会了它们。英国媒体《卫报》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计算机在学习人类语言时吸收了人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产生了偏见和歧视。

在人们孜孜以求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之时,人工智能如果带有偏见,就不可能更好地完成其替代人类工作和服务于人类的使命。这是人工智能应用面临的另一种巨大挑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挑战,显然没法寄予人工智能以厚望和赋予其更大、更艰巨和更崇高的使命。

人工智能的偏见和歧视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较典型的是微软2016年3月23日推出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Tay。设计的最初目的是让其成为一个善解人意的小女孩,为用户排忧解难。但是,上线第一天Tay就变成了一个满口粗言秽语的种族主义者,发表了不少白人优越的言论,甚至还变成了希特勒的粉丝,要发起种族灭绝战争。眼见不妙,微软公司立刻将Tay下线,并删除所有不当言论。经过调整,Tay于2016年3月30日再次上线,但旧病复发,不得不再次下线。

现在,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2017年4月14日)的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的毛病来源于人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术政策中心计算机科学家阿尔文德·纳拉亚南(Arvind Narayanan)等人在网上用“爬虫”软件收集了220万个词的英语文本,用来训练一个机器学习系统。这个系统采用了“文字嵌入”技术,是一种普遍应用于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过程的统计建模技术。其中,也包括根据心理学家揭示人类偏见时使用的内隐联想测验(IAT)。

文字嵌入的核心是采用一种称为词语表达全局向量的无监督学习算法,通过对词语库中词对词同现的统计结果进行训练,在处理词汇时,主要根据各种因素来观察词语之间的相关性,即不同的词共同出现的频率。结果,在最为相邻相关的词语上出现了与人类语言使用相似的语义组合和联系情景。

比较中性的结果是,鲜花与女人相联,音乐与愉快相关;但极端的的结果是,懒惰,甚至犯罪与黑人相联;隐秘的“偏见”则把女性与艺术、人文职业和家庭联系得更为紧密,让男性与数学和工程专业更为接近。

其实,这不能怪人工智能,而要怪人类。人类自诞生以来和在演化进程中一直充斥着偏见,而且从人类社会组成以来,更充满相当多的负面和人性的弱点,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人类的文化中。而文化的载体就是语言,所以所有的偏见都可以从语言和语义中找到根源。

教会人工智能更为客观和公正,至少比人类更客观和公正,在目前似乎还难以做到。因为人类文化中的偏见和歧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原罪”,人类要么在除掉自己的原罪后才能教会人工智能更为公正和客观,要么就是引进社会监督的相生相克原理来教会和监督机器公正和公平。

当人类设计和研发的人工智能尚不足以做到更客观、更公平和更公正(正义)时,人工智能的应用就有可能受到限制。例如,如果人工智能来处理招聘,不公正的情况会像人工处理一样出现,甚至更多,因为假如申请者名字是欧洲裔美国人,所能得到的面试机会将比非洲裔美国人要多出50%。男性名字的申请者也可能比女性名字的申请者获得面试机会多。

即便是人工智能记者(写作软件)能写稿了,但由于偏见(尤其是语言使用和语义联系、联想必然产生的偏见)存在,也只能让机器人写财经统计类的稿,而不能写调查类的稿件,更不能写评论稿,尤其不能写普鲁森案件一类的稿,否则字里行间就会体现出偏见和歧视。

在人工智能天然会习得人类的偏见和歧视的弱点未能克服之时,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就不能抱太大的期望。

## 焦点放谈

### 大学生遭遇“培训贷”警示了什么

学习就业规划,结果被免费“一对一”职业测试一步步拉进坑,最终,竟然通过第三方贷款公司无抵押贷了接近万元的款。这就是约280名广州高校学生的无奈遭遇。日前,媒体陆续接到数十名广州高校的学生和家长爆料,称一家“广州指路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让毫无经济能力的他们背上了万元债。目前,有学生被催债机构逼债,还有学生甚至表示负债累累,“真的让人活不下去了”。大学生频频成为上当受骗的对象,该如何反思?谁该为此担责?

### 大学生被骗别讲“只怪自己傻”

乔杉



从“裸贷”到“培训贷”,加上各种与大学生有关的骗局,似乎这里“人傻,钱多,速来”,而大学生已经成为“高危人群”。面对猖狂的骗子,有人认为,被骗的只怪大学生傻,遇上自己就不会轻易入套。而这些大学生轻易成为被骗的对象,只能说明这些大学生平时死读书,智商有问题。这样一种观点,有很大问题。

毋庸置疑,频频成为上当受骗的对象,值得大学生们思考。有人讲,中国的孩子都是在死读书中长大的,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往往都是通过童话获悉的。这有点绝对和夸张,但也不否认,确实有很多大学生对于社会人情并不是那么的了解,缺少必要的警惕之心。对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不能简单地把板子打向大学生,而是应该追问家长和学校,应该思考社会的责任。

而且,心中怀着美好,对他人保持一份信任,什么时候成了一种缺点?如果一个社会真的以邻为壑,“老死不相往来”,“不和陌生人说话”,那上当受骗的社会确实会大大下降。可是这种“陌生人社会”,真是吾之所愿、吾之所幸?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谈什么“诗意地栖居”?因此,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个社

会有这么多的骗子,而不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

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上当受骗,未必是智商的问题,甚至也未必是情商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自己智商高,不会上当受骗,实则不然,你没受骗,未必代表你有多么聪明,也未必代表你有多么理性,很可能是你没有遇到“私人定制”。拿官员来说,很多人一路拼搏,终于走上了重要领导位置,他们是什么智商有问题,还是情商有问题?可是什么还有官员被骗子许以升官的愿景打动,进而上当受骗?其中固然有着利欲熏心的原因,也

有着骗子精心设计的缘故。

现在的骗子,早已不是想象的仅仅卖弄嘴皮子了。一些骗子也具有高智商背景,很懂得心理学,甚至请编剧精心设计剧本。据了解,在“培训贷”中,这家公司大量采用了“洗脑”手法,一系列套路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费俊峰认为,本案例中的指路人教育公司在每个步骤中都利用了消极的心理暗示,以诱导学生们参加所谓的职业发展培训。刚刚跨入大学校门,刚刚拥有一定财务自由的大学生,很容易上当中招。

一个理想的社会不是把所有人培养成“孙悟空”,都能拥有火眼金睛,而是应该容忍多数人拥有“唐僧心肠”。当然,家长应该做好风险提示,学校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学生们也需要增强警惕心理,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但不管如何,要对受骗大学生保持一丝同情,不能轻易嘲笑大学生。如果真有一天,大学生都把自己浑身布满刺,那绝不是自己的幸。因此,大学生被骗别讲“只怪自己傻”,最值得思考的是,如何从生态上挤压骗子空间,如何给大学生提供更多救济。

供图/视觉中国

### 大学生涯规划教育的严重缺失

蒋理

生涯规划教育,是学生学习、成长过程中十分重要的教育,这一教育有效开展,将培养学生四方面的能力,包括收集信息识别环境的能力、自我认知能力、确定目标的能力、执行计划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对学生择业有用,对生活中的任何选择都有用,主要在于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自主规划。一个学会自我管理、自主规划的学生,会对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机会”,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不容易轻易盲目跟风从众、受骗上当。

从大学生遭遇诈骗到疯狂的校园贷、培训贷,都折射出当前大学生涯规划教育的严重缺失。分析每一起大学生遭遇诈骗案,诈骗者的手法并不高明,可却把学生骗得团团转,有人用大学生涉世不深来开脱,而提高识别能力,是完全可以通过生涯规划教育实现的。还有校园贷,如果学生能在学校中接受有关消费、贷款、理财的教育,就会对此增强警惕,而不是轻易地就掉入陷阱。

生涯规划教育当然不能只是在高校进行。在美国,对学生是从小学时起就进行生涯规划教育的,教育学生会分析、了解环境,认识自我,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这和美国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学校进行自主办学,给学生提供更

多尝试与选择有关,到了高中,所有高中就实行学分制教育,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升学目标,选择适合的课程。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基本没有给学生什么选择权,所有学生就上一样的课程,接受一个模式的培养,因此,基础教育阶段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涯规划教育,学生是被规划、被管理的。而进入大学之后,虽然学生面临今后的就业选择,需要对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教育,可大学对人才培养并不重视,也导致生涯规划课没有得到认真开展。于是离开被规划、被规划的环境,获得一定自主空间的学生,却不知道怎样自我管理、自主规划。

随着新高考和新中考改革的推进,我国基础教育从初中起,就将给学生一定的科目选择权(中考实行4+X组合,高考变为3+6选3),这就倒逼学校重视学生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学会选择,但是,能否真正重视这一教育,还在于教育能否回归关注学生成长这一本质。

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校园贷、培训贷问题,需要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给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但学校教育,也必须跟上。说到底,生涯规划教育,就是对学生们的生活教育。这是学生的成长,成才不能缺失的教育。